

章开沅著

从耶鲁到东京

FROM YALE TO TOKYO

TRACING THE
EYEWITNESSE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KING

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人们都说

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

日本不如德国。

我不愿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而宁可说日本政府不如德国政府。

但不愿承担战争责任

何况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责任，

这是涉及到数千万人死亡与财产

人们不会原

任的政府毕竟会使自己的民族蒙受羞辱，

损失难以数计的巨大侵略罪行，

谅那些继续掩盖真相与推脱罪责的日本政府。

只要这样的政府存在，

尽管日本多么富有，

多么强盛，多么勤奋，多么能干，

他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难以受到

应有的尊敬，

更难以赢得真正的友情。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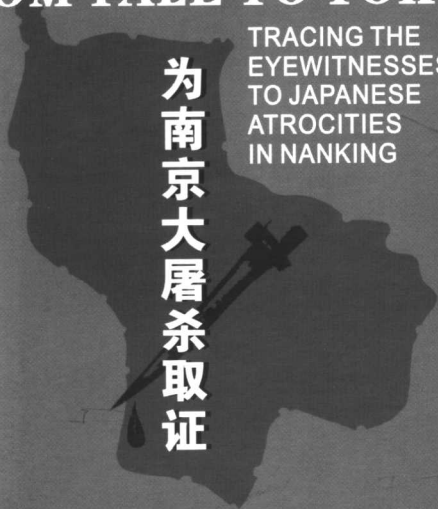
章开沅 著

从耶鲁 到东京

FROM YALE TO TOKYO

TRACING THE
EYEWITNESSE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KING

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DA 11 3/1/03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章开沅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 7-218-04351-8

I .从... II .章...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816 号

责任编辑	倪腊松 崔肇钰
装帧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12
字 数	25 万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351-8/K·886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为了历史的尊严

章开沅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可亲的长者。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在耶鲁神学院发现了以贝德士博士（也是章先生早先的老师）为代表的原金陵大学以及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部分外籍教师和传教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词，并由此一头扎进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终于在古稀之年迎来了又一个学术高峰。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合编）、《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等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章先生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再是书斋里纯粹的学术，他还参加了大量的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足迹遍及中国、北美和日本。章先生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为了探讨问题，切磋学术，而是为了捍卫历史的尊严，呼唤人类的良知。他不顾年迈，顶住各种压力、恐吓，同妄图否认侵略战争罪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势力，尤其是日本国内气焰十分嚣张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此

过程中，他结识了唐德刚、邵子平、吴章铨、张纯如、汤美如、王选、朱成山、松冈环、石田美子、田中正俊、林伯耀、东史郎等许许多多为捍卫历史尊严而奔走驱驰的志同道合的人士。在北美，章先生参加了对日索赔会和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一系列活动，寻访了当年金陵大学和南京安全区那些历史见证人的后裔，并且经章先生的深入搜寻和梳理，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当时有一个对南京、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并以“南京帮”（Nanking Gang）自称的小小外国人团体及其事迹。他们在南京大屠杀那场浩劫中，虽然手无寸铁，却在日军的屠刀和铁蹄下，无私无畏地对数十万难民进行了救助，并且将他们目睹和亲历的一切记录下来，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的铁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恩德！在日本，章先生多次参加了抗议军国主义、声讨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多次发表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抗议军国主义的演讲。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和自觉的，没有任何官方的背景，也没有任何官方的支持；他们的一些活动经费也是自筹的，更不要说能从中获得报酬。他们为良知和正义所驱使，他们因良知和正义而崇高。虽然日本政府从未真正认真地反省战争罪行，屡屡做出伤害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但从章先生书中、从其他各种媒体上了解到，在日本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像东史郎这样良心发现的参与侵华战争的老兵从灵魂深处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谢罪，并勇敢地站出来向世界揭露自己所亲历的侵略战争和犯下的罪行；也有越来越多的像松冈环这样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后继者，不断地加入到反省历史、伸张正义的行列

当中——他们对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极其艰难而深入的取证活动；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和途径向日本国内民众宣讲历史的真相；他们还为中国民间就日军性暴力、细菌战、集体屠杀等各种战争罪行向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的善意之举、正义之举屡屡受到右翼分子的恐吓和威胁，但他们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实在是一群最可爱的人。有了他们为良知、为正义所为的善举，我们的心灵才感受到一些慰藉。

本书正是章先生对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所遇见的人、所经历的事的一些真实记录，也是章先生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近15年的一个总结，所以书名叫做《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章先生说，50多年前，他的老师贝德士博士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控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后又带着包含大量证言、证据在内的全部档案回到了美国，并最终使这些档案特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走的是从东京到耶鲁的路线；而他本人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从在耶鲁发现贝德士文献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开始，并进而将活动从北美延伸到日本的，走的则是从耶鲁到东京的路线，与他的老师正好相反。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注定的机缘呢？

章先生将书稿交给我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些与其研究活动有关的图片和报刊资料，其中有一组图片特别耐人寻味。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章先生的，编排整齐，有20幅之多，都是纪念和告慰日本在侵略战争中阵亡将士亡灵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多数称作“慰灵碑”，有的叫做“显彰之碑”，有的叫做“战

友之碑”，还有叫做“殉国烈士之碑”的。不少纪念碑的旁边还建有观音塑像，无疑是寓意要借观世音的神通超度这些死者的灵魂。看着这些建造精美、祭扫隆重的纪念碑，看着碑上“烈士”、“殉国”、“显彰”之类字眼，联想起东条英机那死不悔改的神情，历届日本政府妄图否认战争罪行、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作为一个受害国的公民，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心里当然充满了愤慨！这些曾经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侵略者，理应万劫不复！尽管其中一则碑志的说明文字中写到，“愿中日两国阵亡者超越恩怨永享安寝”，虽然我不愿也不想去怀疑立碑人的良好愿望，但在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没有进行认真检讨、反省，并对受害国谢罪的情况下，任何受害国的公民决不会接受这超越恩怨的“善意”，很难做到如此的“超脱”。从宗教的意义上说，这些在侵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灵魂也是需要拯救的，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但是只有放下屠刀，才能立地成佛！加害国政府必须认真反省历史、向受害国诚心谢罪！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这一座座慰灵碑就真成了抚慰战争罪犯亡灵、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纪念物，当然也就是所有受害国公民应常悬于眼前的警示牌、常鸣于耳际的警钟！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是，国内也有这样一种对日关系的“新思维”，认为我们不必在中日关系上老纠缠历史问题不放，应该更理性更宽容一些；认为我们不妨“大致搁置”历史问题；认为我们应支持日本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帮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所谓的“新思维”一定深得日本右翼分子好感。我很赞同一些专家的观点，对历史问题，“我们想搁

置也无法搁置”，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让步”，甚至支持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并不能达到提升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战略合作的目的。欲速肯定不达！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从抗战胜利那时起，对中日关系问题一直采取“以德报怨”的友好态度，宽容与理性之至，苍天可鉴！可这并不能促使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进行认真反省并采取积极的行动，反而极力掩盖战争罪行和粉饰军国主义。我实在不明白我们还能怎么宽容，还能怎么理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同中国以及亚洲各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不可能逾越的，因为今天是从昨天走来。战后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那样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政府不能像德国政府那样正视历史并对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认真而深刻的反省。没有日本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反省并向受害国悔罪谢罪这个前提，支持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后果将是令人担忧的，甚至是严重的。

我们将这些图片收入书里，一者作为反面教材，让世人看清，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的阴魂不散；二者也是促使我们反省，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那些战死沙场的抗日先烈，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忘了那一段中华民族沉痛的历史。我们还特别挑选了两幅纳粹德国集中营纪念馆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德、日两国对待历史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人类的良知不会泯灭，历史的尊严应坚决捍卫！

倪腊松

2003年8月

缘 起

从1988年初夏在纽约参与对日索赔会的筹建，我介入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论战已有1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然而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仍未终止。正如章太炎在20世纪初所曾预言：“善亦俱进，恶亦俱进。”

很多中外友人都知道，我虽然教中国近现代史，但并未着重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侵华日军暴行史。自从1979年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我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和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众多学界友人的深情厚谊更使我终生难忘。我像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愿也不忍重新揭开历史的疮疤，惟恐因此而可能伤害这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新局面。然而严酷的现实终于使我们逐渐醒悟过来，因为在美丽的扶桑还存在着另一种日本人。他们始终不甘心于侵华战争失败的结局，并且念念不忘为这段残酷而又丑恶的历史翻案。他们的人数不多然而能量颇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地掀起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翻案的风波，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甚至幻想重温雄踞亚洲并且争霸世界的旧梦。作为受害最为深重的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我不得不挺身而出，回击这种嚣张的挑战，捍卫历史

的真实与民族的尊严。

然而历史终究是有偶然性的，也可以说是某种历史机缘把我迅速推向这无止无休的论战的前沿，尽管我一向不喜欢也不善于辩论。

1988年5月，我应邀参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记得是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筹建对日索赔会问题，并且当场邀集发起人签名。当时从大陆到会的中国学者只我一人，因此便成为义不容辞的祖国大陆当然代表。他们似乎事先已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有所联络，所以他也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在我提笔签名之际，旅美华裔女作家丛甦还在一旁笑问：“你敢签吗？”我也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乎？”立即引起一片欢笑声。根据我的理解，丛甦以为大陆学人在国外一般是谨小慎微，惟恐触犯什么“外事纪律”。我则认为此乃民族大义，签名参与发起对日索赔会应属理直气壮，有何后顾之忧！从此我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维护历史真实的庄严斗争。

由于国家教委对我这个年迈的大学校长的特别关照，会后有一个月的学术休假可以在国外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坦率地说，当时我还顾不上查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献，而是专程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初步检索中国13所教会(新教)大学的档案全宗。但工作开始不久，我就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博士(Dr. Miner Searle Bates)的个人专档。贝德士是我就读金陵大学

期间的业师，对于他的相关文献我自然怀有浓厚兴趣，所以便集中好几天时间粗略检索这些卷宗的内容。没想到其中竟保留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包括该会来往公文及其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但当时由于校务的牵挂，除稍做索引外没有可能认真阅读与研究这批文献。

直至1990年8月，我总算摆脱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到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第一年(1990年8月至1991年6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仍然顾不上接触耶鲁神学院这批藏档。1991年7月，我得到耶鲁大学历史系邀请并获鲁斯基金(Luce Foundation)资助，专程前往该校神学院图书馆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全档。为了便于工作，我与妻子(黄怀玉)就住在靠近该馆的学生宿舍中，历经酷暑寒冬在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档案堆中整整泡了8个月，直至1992年3月应聘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经过逐卷检阅，我发现并复印了1000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宝贵资料，并同时复印一套送给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Alliance in Memory of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其前身即对日索赔会)，这是我旅美三年极大的收获之一。

但是，在美国大学教书非常花费时间与精力，所以执教加州期间也顾不上整理与研究这批复印资料。



我们夫妇与鲁斯基金会副主席 Terrill Lautz 在该会总部(纽约)会晤。
我三次在耶鲁研究“南屠”，主要由该会资助(1998.6)

1993年夏天应邀访问日本，随后又在8月底应聘前往台北在政治大学讲授“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等课程。滞台期间虽然教学任务较轻，但有“会议、讲演、稿约、应酬”四多，所以也没有余暇研究这批资料。直到1994年春重返武汉，我才有可能把这批复印资料初步加以清理归类，为进一步研究做必要的准备。同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刘苏闻讯前来约稿，希望能在次年夏季出书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这正好符合我的心愿，于是便作为“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书稿，总算对间断已久的耶鲁期间的工作做出初步小结。

1995年元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请我去讲学与研究，直到7月底才

离港返汉。在此期间，由于《星岛日报》、《南华早报》(英文)等媒体的相继采访报道，《贝德士文献》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史料价值，遂为海外许多学者所逐渐知晓。大约是在5月中旬，香港三联书店的年轻编辑李素娥突然来访，建议我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作编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此前汤美如为拍摄“南屠”电影也曾去过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并且还专程到日本、韩国各地访问过若干幸存的慰安妇，我感到盛情难却，而且手头积累资料又较充裕，便立即接手此项工作。香港三联出书甚快，7月初香港图书展览开幕式上即已陈列这本图文并茂的新书——《南京：1937.11—1938.5》，这样就更提高了《贝德士文献》的知名度。

1995年8月中旬，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台北隆重举办了规模很大的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应邀赴会者有31人之多。我在开幕式上作主旨讲演(代表大陆，蒋永敬代表台湾)，题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稍后又宣读了论文《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中央日报》、《联合报》乃至“美国之音”都及时报道，《中央日报》且以“尊重历史，超越历史”一语作为通栏标题，而“美国之音”则误以为我是大陆代表团的团长(其实未设团长)。

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南京、香港、东京、大阪与北美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与研讨会。8月中旬，我参加了南京举办的“南屠”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且参加了中日学

生为“南屠”取证夏令营的开幕式。12月中旬又前往日本，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的主旨演讲，随即在研讨会上又报告了论文《耶鲁神学院藏档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献评述》。这两个会议都开得非常之好，不仅准备周到、内容充实，而且形式多样、气氛热烈，是对日本右翼翻案逆流的有力回击。但正因如此，他们更加恼恨，不仅诬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而且还迁怒于贝德士，辱骂他是“伪证制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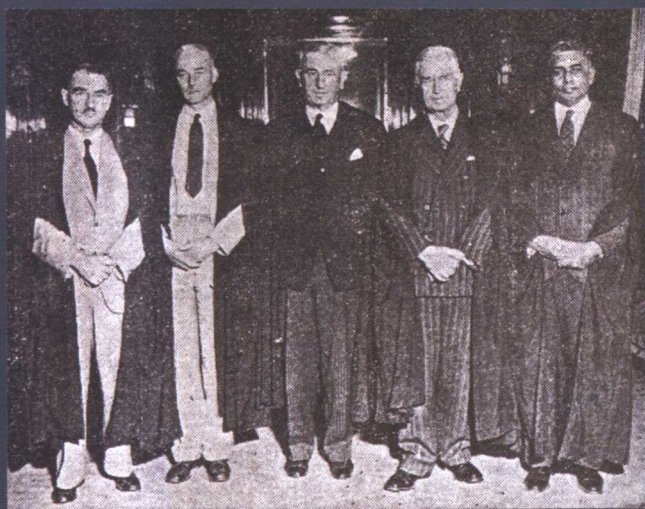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即在《历史研究》发表《到底谁是伪证制造者？》，以确凿而且充分的史实予以严正驳斥。同时，又协助原金陵大学老学长吴天威、郭俊铎，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莱莉(Martha Smalley)合作，并由她出面编辑出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其用意即在于正式公布一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以充分显示历史真相并揭穿日本右翼的无耻谎言。由于全部刊印英文原档，没有经过任何他种文字翻译或加工，这就更为增添了资料的权威性，并且使“贝德士文献”等珍贵史料直接为西方人士所逐渐了解。

但是，由于财力与篇幅的限制，斯莱莉主编的这本书所收文献数量较少，不足以反映耶鲁相关藏档的全貌。因此，经过与吴天威、郭俊铎两位学长反复磋

商，由斯茉莉代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授权我再编辑一本文献数量较大也更为全面的资料汇编。于是，我与妻子在1998年5月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对有关“南屠”藏档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搜索。其结果便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这是目前选辑最为详尽的耶鲁藏档中有关“南屠”的文献结集。与此同时，由于邵子平、吴章铨、斯茉莉诸友人的热心帮助，我们与美国M.E. Sharpe, Inc. 又签订了合同，由该公司于2001年出英文版，完全以档案原文结集出版，只是为了西方读者的方便，作少量必要的历史背景的说明和注释。这样便更加有利于世界各国更多人士了解耶鲁有关藏档的原貌。日本右翼分子总是诬蔑我们缺少南京大屠杀“同时期的第一手材料”，甚至对在西方流传甚广的张纯如(Iris Chang)的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横加攻讦，仿佛她所叙述的大量史事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的书的英文版发行之，正好可以使众多西方读者了解，她的叙事乃是依据耶鲁藏档中有关“南屠”的大量铁证。

这些年，我除做了上述大量文字工作，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分子的种种谎言与谬论。我的用意非常明确，正如我在1995年所言：“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

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我在任何时候都牢记已故老师贝德士的恳挚语言：“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深信，即令我们这一代人不复存在，我们正义的事业也会被一代又一代年轻学者承续下去。



◀ 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与审判官



◀ 南京大屠杀之元凶松井石根出庭接受审判